

西安七贤庄

古城西安的七贤庄自 1936 年至 1946 年的十年间，先后为我党设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交通站、红军联络处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1949 年以后，政府妥善地保护了旧址并建成纪念馆，以后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自 1959 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接待了许多国内外观众。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纪念馆更加显示了她特有的重要教育作用，成为不可多得的国情、党史宣传教育的宝贵资源。

西安七贤庄建筑群位于北新街东侧。1934 年冬，有个银行资本家在北邻崇廉路、西靠北新街的荒地上建房，做房产生意。1936 年春，占地 2.5 万平方米，由西向东，南北走向的十座外观相同、布局略异的“工”字形庭院建筑群落成。

竣工时，西安绥靖公署参议、《秦风周报》社长成柏仁先生借魏晋时“竹林七贤”的美传，取了

七贤庄的雅名题书“七贤庄”三字，由工匠缀嵌于庄首门楼。不久，这个资本家便张榜出售、出租七贤庄各院房。在张学良将军身边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认为此处距火车站近，又较偏僻，是设立地下交通站的理想地方，于是便租用了西头第一号院。同年，周恩来对陪同张学良将军前来肤施（今延安）会谈的刘鼎说，你尽快在西安建立一处交通站，想尽办法采买陕北急用的物资，事情要办得越快越好。

经反复思考，刘鼎决定把交通站建成一所医院，以作掩护。这样，购买大量的药品、医疗器械及急需物资就能瞒过便探、特务的耳目。

于是，刘鼎在上海找到了熟识的朋友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向刘鼎推荐了德共党员、医学博士冯海伯。她说：冯海伯是被希特勒驱逐出德国后到上海的，他技术精湛，在上海开设了牙科诊所，并常到《美国之友》社里来，人很活跃。1935年，张学良将军到南京参加会议，还专程到上海冯海伯处治过牙疾。

刘鼎对史沫特莱推荐的人选感到满意。他与冯海伯见面后，就商定了启程的日子。

两人到西安后，坐着黄包车转遍了古城，踏看医院地址，一致认为七贤庄新房最合适。一切安排

好后，七贤庄的大门上挂上了由上海带来的那块牙科诊所的方形铜牌。

有了牙科诊所这一名义，交通站可以公开从车站、邮局取回史沫特莱、艾黎等人为红军购买的大批药品与医疗器械。地下党的同志又把药品和其他物资混在一起，源源不断地送过来，由刘鼎出面，和搞这项工作的刘向三、王立人等人将货物通过东北军 67 军军部汽车转送陕北，为红军解决了大问题。

为了把陕北与各地的电讯联系起来，刘鼎让地下工作人员涂作潮把一台 100 瓦的电台，安装在七贤庄一号院的地下室，由他和苏区派来的彭绍坤一起在这里工作。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冯海伯在赴西京招待所与史沫特莱会面的途中被流弹击伤而牺牲在西安的王炳南、刘鼎等人安葬了冯海伯。王炳南在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共办的西安《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冯海伯的葬期及其生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形势及蒋介石的政策发生了大转变，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 年 1 月底 周恩来派李克农前往潼关 与

顾祝同会谈，商议关于在西安建立红军联络处之事。会谈上报后，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从此，七贤庄就成为红军联络处。鉴于红军联络处还不能完全公开，所以大门上只能挂“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教导队通信训练班”的牌子。警戒工作由西安绥靖公署负责，警卫人员住在大门东侧房。

1937年2月初周恩来迁出张公馆搬到了七贤庄一号。在这里，他与叶剑英一起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周恩来曾三次会见东北军政训处处长卢广德，要求他广泛接近干部，做稳定军心的工作。他还接见东北军的军官们，并指挥大家一起唱《松花江上》勉励大家团结抗战。

1937年2月至7月周恩来从七贤庄出发先后到上海、杭州、南京、庐山等地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团结抗日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形势的发展，为红军联络处营救被关押和流离失所的红军西路军提供了机会。党派出张文彬、张正华、吴波等人到青海、甘肃、宁夏设法调查营救。周恩来亲自到回民阿匍马德涵家里，请马先生到青海做其学生马步青（军阀）的工作，释放被监禁的西路军官兵。据统计，其间经红军联络处回到革命队伍的有四千多人，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批有

一千四百多名。

红军北上抗日 after，南方各省的党组织几乎都被破坏，逐步恢复的党组织及党员寻找党中央，不论是来人还是写报告都要到西安七贤庄联系。许多党员要求在此恢复组织关系和组织生活，要求到延安去。据统计，由红军联络处送入延安的有七百多人。当时，红军联络处还承担了中央军委联络部、外交部的双重任务。

红军联络处在七贤庄十年的光荣历程功不可没。

卢沟桥事变以后 抗日战争爆发了。为了表示我党团结抗日的诚意，中央军委根据协定于 1937 年 7 月 18 日发布命令，命令红军按照国民党革命军的序列，改编为八路军，由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对日作战。

1937 年 8 月 22 日，七贤庄一号的大门口挂上了“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依据战斗序列的变化，于 9 月后又更改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简称西办）”，西办从此成为我党设在国民党辖区的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



图1 卢沟桥事变后改称为
国民革命军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于 1937 至 1940 年任陕甘宁边区主席，常奔波于延安与西安之间。1940 年 7 月至 1941 年初，在七贤庄担任中共中央驻陕代表的是董必武。西办的第一任处长是伍云甫，副处长是李华；第二任处长是周子健。西办的宣侠父是八路军总部的少将高级参议，他是周恩来和叶剑英调来做上层的统战工作的。西办所

设的中层部门有统一战线科、交通科、机要科、秘书科、办公室、总务科、经理科；下属部门是汽车队、仓库、招待所，《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分销处，防空处。西办的工作人员约有 300 人。

1937 年 8 月 25 日朱德、彭德怀在七贤庄通电全国，几日内，各救亡团体和各界名流的贺电、贺信纷纷寄到七贤庄，负责这项具体工作的王宇说，贺电、贺信装了满满几箱。

自 1937 年 8 月至抗战胜利，西办的主要工作是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

当时，西安有救亡团体 20 多个。西办帮助他们培养骨干，送他们学习材料；安排各救亡组织的领导与骨干到七贤庄一号院开会，向他们介绍全国各地的救亡形势和前方战况。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中国抗日民主先锋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办公地方，平民坊 5 号院有空房，西办就安排他们在那儿建立办事处，并把中国抗日民主先锋队西安队部、西北队部、全国总队部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党团合编为一个支部，与在这院里同住的宣侠父一起过组织生活。原西北特别支队徐彬如和学联领袖曹冠群的爱人，宣侠父的爱人加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后，该会便组织妇女同胞搞宣传和募捐活动。她们

到伤兵中去讲抗日，为他们送水喂饭、写家信，还把募捐来的大批寒衣及用品送到西办。妇慰会还把奔赴延安的女青年介绍到西办来，因为外地青年到西安找妇慰会容易闯过沿途关卡，可以使去延安的女青年减少麻烦和危险。

1938年2月，国民党省党部令中国抗日民主先锋队等组织解散。5月省党部出动军警宪兵对民先队活动中心平民坊5号和西安师范进行了搜查。当局宣布解散13个救亡团体，并逮捕5名青年，这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林伯渠、伍云甫一面与当局交涉，一面亲赴监禁地慰问。9月，周恩来来到西安后，打电话给西北行营，并亲自出面交涉，终于使青年们恢复了自由。此外，西办经常编写通俗易懂的演讲词，编排短小精悍的节目，深入街头巷尾，给群众作宣传。西办还派人到学校去讲课，讲课内容有辩证法、游击战术、战地救护及防空袭等。

西办还经常安排留住七贤庄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如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到抗日救亡团体、学校去作报告，号召人民群众参加到救亡运动中来。

抗战时期，西安及关中有许多青年奔向延安和前方。1937年冬，几个医院的年轻医护人员决

心组织前线救护队。他们以罗锦文为首，多次到七贤庄与工作人员倾心交谈。彭总在来电中写道：若不嫌前方苦，则十二万分的欢迎。14个自愿上前线的医护人员由西办派人送往华北。

1938年3月，丁玲带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西安，在大后方开展宣传活动。当时主持西办工作的林伯渠和宣侠父给予他们许多帮助和支持。

西办对各地到西安的文化名人给予热情接待。1938年李公朴由西北民族大学到七贤庄，林伯渠亲自陪同他到安吴堡青训班参观，使他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刘古风、梁漱溟几次为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奔走，西办给他们安排汽车，派人护送到延安。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国，有利于两党的团结的事，西办始终给予帮助与支持。

抗战时期，世界各国人民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们组成救护队，且有许多记者到实地考查。其间由西办护送的有白求恩、史沫特莱、斯诺夫妇、贝特兰、米勒、希伯·汉斯、路易·艾黎、范查理、詹金斯、伊文思、马海德、爱泼斯坦、胡志明、野坂参三，以及世界学联代表、印度援华医疗队、塔斯通讯社战地记者等。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侨胞也纷纷行动起来，加

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他们将捐助的大量外汇集中在香港廖承志主持的八路军办事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1940年5月回国内考查。他到西安后由西办的伍云甫处长等人陪同前往延安。

西办建立后，后勤工作十分繁重，采办委员会遂改为经理科。先后担任经理科的负责人有张元培、吴习智、汤池、喻杰。

经理科在西安设有北关十三号仓库、兵站、车队、大车队，在宝鸡、长武、澠池、垣曲等地也设有仓库，并建立了一条西安至太原的兵站线。

1937年11月，叶剑英由南京打来电报，告知有几十万发炮弹要送往前方。经理科的同志一齐出动，将这批武器转送前方。1938年《新华日报》华北版印行，西办还给《华北日报》运送铅。

为了解决延安的保育院、医院伤病员和领导人员的营养补充，需在延安建立一个奶牛场。西办经理科的工作人员请红十字会脑外科专家万福恩出面帮助，在河南洛阳买了十多头奶牛。在洛阳站，西办的押车副官被特务打得头破血流，但同志们仍将货物运回来，并把奶牛送到延安。

当时，延安的学校、机关、部队、老百姓看的书

报相当一部分是由西办采买后运到延安的。西办刘岩等人经常在书店购书，叶季壮的秘书还按毛泽东列的购书单，买过线装书籍。

“七·七”事变以后，大批的青年要求到延安去，人潮涌向七贤庄。



图2 青年涌向七贤庄

西办秘书科为此特设学生股负责接待、审批、组织赴延青年的工作。他们每日在接待室与学生谈话，指导填表。有党团组织关系的学生，还要在另一个小会客室转换组织关系，要转入延安的，由西办统一电告。

有着“一二·九”学生运动革命传统的平津师生到七贤庄后，林伯渠在办事处接待他们，并帮助

他们前往延安。

特别可贵的是，有六万多名华侨青年直接参加了对日作战，其中有 2000 人冲破阻挠与封锁，冒着生命危险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经西办进入延安的青年有 650 多名），华侨巨富胡文虎为抗日捐款、捐物数十亿，他的女儿也进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1938 年 4 月，延安抗大、陕公、鲁艺、青训班等校派来干部，租用七贤庄 7 号院，同西办一起成立招生委员会，共同担负起招收青年的工作。为了便于接待，他们还在毗邻革命公园等处租借房屋开设招待所，帮助解决部分青年的住宿与吃饭。

据当时做接待青年工作的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说，陕公学生近万，几乎都是从西安过来的。据统计，仅在 1938 年年初的三个月中，西办就接待了 2200 多名学生，其中以四川、河南两省的女学生居多。

在千千万万奔赴延安的青年中，有放下锄头、离开机器的农民与工人，有缠过脚的小学女教师，有怀抱婴儿的年轻夫妇，有背着父母离家出走的青年，有漂洋过海的华侨青年，还有富家子弟和官僚家庭的子弟。

七贤庄 这座被先辈们喻作迈向革命的桥 曾

有千千万万的人走过 七贤庄 这扇被先辈们喻作通向延安的大门 曾有千千万万的人们进出 七贤庄 这个被先辈们喻作的交通枢纽 曾经运送千千万万的人们走向 天南地北。那每一个由此走上革命征途的人 那每一个由此奔向抗日疆场的人 无不对它充满了深情。七贤庄 在他们心目中丰碑永驻。

七贤庄的故事

七贤庄光荣的十年已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以下便是我们从史册中辑录的一些动人的故事。

牙医博士冯海伯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党为了着手解决红军药品和医疗器械不足的问题，委派刘鼎在西安设立交通站，并负责在白区的采购和集运工作。

1936年初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已建立了良好关系。2月初，王世英等人由天津到达西安，秘密会见杨虎城，商定在西北军掩护下建立红军交通站等四项协议。2月25日李克农从瓦窑堡抵洛川会晤王以哲，又与东北军达成开放几个口子以运输物资并予以保护等三项口头协定。

于是刘鼎为交通站作了巧妙的设计：在交通站设立一所医院。这样，大量的医药器材进出就有了方便的借口，容易瞒过特务的耳目。

刘鼎为此去了上海，请史沫特莱帮助物色人选。史沫特莱认为冯海伯能胜任这项工作，于是向刘鼎推荐了他。

冯海伯很早就投身德国的革命，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毕业于柏林大学，获牙科博士学位。王炳南同志留学德国的时候，两人曾在一个支部里活动。1931年，冯海伯因为是犹太人，受到法西斯分子的迫害而流亡到中国。

在上海，冯海伯开办牙科医院，以诊治口腔疾病为职业。他的医院规模不大，只聘用了一对德国夫妇做助手，男的镶造假牙，女的操持家务。

冯海伯毕竟是一个共产党员，流亡生活没有使他忘记自己的誓言。当史沫特莱请他加入“美国之友”社的时候，他立刻加入了。当史沫特莱推荐他去西安开医院，掩护红军交通站的时候，他也立刻答应了。他收拾好全套的设备和药品，同两位助手一起迁往西安。

刘鼎雇了辆黄包车，与冯海伯一起踏勘院址。他们转来转去，看了几处房子，最后认为新落成的七贤庄是合适的地方，因为此地北靠城墙，东邻火车站，南连杨虎城官邸，是一处高墙环绕、门户严实的深宅大院，可以做交通站。

1936年，七贤庄一号院挂出“德国牙科博士冯

海伯牙科医院’的铜招牌 冯海伯‘开业’了。还是在上海的时候，他为张学良诊治过牙疾，张将军曾聘他做自己的牙医顾问。医院搬到西安后，张学良来过，东北军、西北军的将校和地方士绅，也络绎不绝地前来看牙，一时间，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冯海伯一面行医，一面订购医药器材。邮包不断从各地寄来，当物资聚集到一定数量时，就由王立人、刘向三出面雇请商车，或干脆利用东北军的军车，一趟趟运往陕北。

冯海伯身处局势动荡的西安 和交通站的工作配合默契 红军集运物资的工作高效率地运转着。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发生了。清晨四五点钟的时候，疏疏落落的枪声惊醒了梦中的市民。冯海伯披衣下床走到院子里，但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他想起这天同史沫特莱有个约会，决定提前赴约，去西京招待所。在路上，他不幸中弹身亡。

叶剑英把安葬冯海伯的任务交给王政，特别指示要在他的遗体上覆盖党旗。王政找来了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和一副棺木。1936年12月19日，《解放日报》（原《西京日报》）刊登了王炳南为冯海伯写的讣告。

安葬冯海伯那天 天上下着鹅毛大雪 古城西安银妆素裹，冯海伯安息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二

天，一块镌刻着“牙科大夫冯海伯之墓”的石碑立在了他的墓前。

崇高的追求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遍燃中国大地的时候 印度的援华运动开展起来。印度的国大党组织运送援华的医用物资 并派医疗队来帮助中国抗战。

印度援华医疗队是 1938 年 9 月 1 日离开印度的。队长爱德华曾参加过国际纵队红十字会，代表印度支援过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副队长卓克华是位有经验的胸外科专家，其他三位是巴苏华、木克华与柯棣华，都是医科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大夫。他们带来了一辆救护卡车、一辆救护轿车、63 箱药品和一些外科器械，还有一架轻便 X 光机。

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最终目的地是延安。他们在踏上中国国土后，为表达自己的心愿，在每人的名字后面都加上了一个“华”字。他们辗转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后 于 1939 年 2 月 2 日到达西安。

来到西安后，爱德华及其同伴们几乎是每天都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有时是办事处的同志们到西京招待所看望他们。其间，林伯渠正在七贤庄，他是中共中央驻陕代表，又是陕甘宁边区政府